

# 香港青年的中國觀： 民族認同與學生運動

• 林芬、林斯嫻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1960年代以來三大領域的香港學生運動——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和港陸爭議，梳理「中國人」的含義在香港的演變，以及中國認同和學生運動之間的互動過程。本文認為，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是認同的「邊界機制」(boundary mechanism)與「象徵性資源」(symbolic resources)在不同社會結構下結合的結果。不同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針對不同「他者」建構「中國人」的含義：當「他者」來自異質文化時，學生傾向使用有機型機制來定義其中國身份；當「他者」來自同質文化時，志願型機制更為普遍應用。此外，前一場學生運動的結果通常引導學生對其「中國人」身份進行重新定義，而這種再定義又影響着下一場運動的訴求與方向。可以說，「中國人」的具體內涵隨着時代演變，民族認同與學生運動互為因果。而當下香港青年的民族認同危機影射了港陸雙方在象徵性資源和認同機制上的偏差。

**關鍵詞：**中國身份 民族認同 香港學生運動 邊界機制 象徵性資源

香港近年來正在經歷一場民族認同危機。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自回歸以來，愈來愈多的香港青年(18至29歲)拒絕在自己的民族身份中加上「中國」這一標籤。從1997年7月到2017年6月止，在香港人的四種身份類型(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中，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青年從45.6%增長到65.0%，認同「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的從37%下降到28.7%，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年則從16.1%下降到3.1%(圖1)。與此同時，香港正逐漸轉變成「運動型社會」。根據香港警務處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公眾集會與遊行的數目從2006年的2,228起增長到2016年的13,158起，增幅將近六倍<sup>①</sup>。尤其是在爆發涉及港陸爭議的「反高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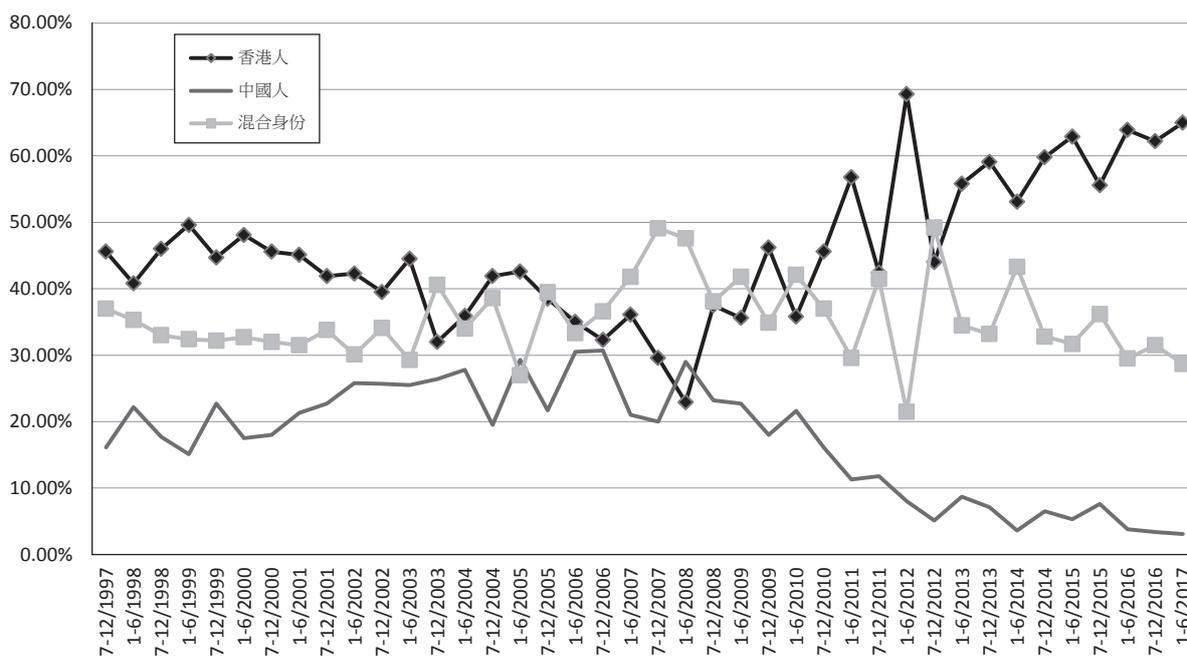
運動」(2009)、「反國教運動」(2012)、「雨傘運動」(2014)之後，香港社會湧現「反中」情緒：不僅在文化上排斥「內地」<sup>②</sup>，比如簡體字、普通話和內地遊客；政治上更出現了極端聲音，要求「香港獨立」。

但是半個世紀前，許多香港青年對中國的感情卻是截然相反。尤其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學生提出「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甚至有人視「香港回歸」為未來出路。與他們的祖父輩相比，如今的「網絡廣場世代」(net-gen square people)<sup>③</sup>——即了解數位媒體，政治活躍度高，通過線下或線上「廣場」相互聯繫的年輕人——對中國的態度卻有了極大反轉。為甚麼不同代際的香港人對中國的態度出現如此變化？「中國人」這個身份究竟代表了甚麼含義？甚麼樣的因素和機制導致了如此變化？這種身份認同又如何影響香港的學生運動？

民族認同是支撐國家合法性的基石之一。正如政治學者哈斯(Ernst B. Haas)所言：「當民族認同陷入疑問之時，一根支撐着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支柱也就坍塌了。」<sup>④</sup>香港人的民族認同轉變反映了深層次的國家合法性危機。目前港陸雙方無論是官方還是民眾，彼此了解與互信仍顯不足，更有許多內地人因為近年來發生的學生運動而對香港的年輕人產生負面印象。赴港旅遊的內地客數量減少，內地學生報考港校的意願亦減弱，誤解與矛盾嚴重阻礙了兩地的交流<sup>⑤</sup>。

因此，本研究針對學生運動和民族認同的關係進行論述。我們集中關注學生群體有三個原因：其一，學生通常是理想主義者，發起運動時很少會局限於派系爭端或生計原因，因此他們的訴求往往最能直接體現當時的社會

圖1 1997至2017年香港青年(18至29歲)的身份認同(香港人/中國人/混合身份)



數據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市民的身份認同感〉，香港大學民意網站，[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http://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

良知 (social conscience)；其二，學生運動是代際之間思想變化的風向標：當年長一代的思想太過保守而不適應新環境下的社會發展時，年輕一代的聲音就會變得尤其響亮<sup>⑥</sup>；其三，學生尤其是學生運動領袖，很多都是潛在的社會精英，對未來的公共輿論有巨大的引導作用。我們的研究素材主要來自香港不同政治立場（親建制、親泛民、中立三派）的媒體、八所大學的學生出版物（如《學苑》、《學聯報》、《理大學生報 PolyLife》）、政府聲明和官方統計資料<sup>⑦</sup>。通過這個案例研究，我們希望為港陸關係提供一些新的觀察，亦希望為其他經歷認同危機的地區提供比較案例。

## 一 民族認同：邊界機制與象徵性資源的組合

「民族」(Nation) 是指「一個已被命名的人類種群，其所有成員擁有歷史形成的領土、共同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的經濟以及共同承擔的法律權利和義務」<sup>⑧</sup>。而民族認同則是將個人與其種群聯繫在一起的情感紐帶，它由一系列相互影響的要素（即下文提到的「象徵性資源」）建構而成，包括種族、文化、領土、經濟和政法體系。傳統的民族認同研究經常將民族認同劃分為「公民型」(civic) 和「種族型」(ethnic) 兩類。公民型民族認同的合法性與凝聚力通常源自其成員對某一系列政治原則與機構的自願遵從；與此相對，種族型民族認同的形成則建立在由某些「自然」因素所主導的自我認同感上，比如語言、血脈、種族<sup>⑨</sup>。儘管「公民型/種族型」的兩分法極具啟迪性，但民族認同的產生是一個在大眾媒體、社會運動等公眾話語平台中被不斷「建構—解構—再建構」的動態過程。不同社會中，公民型認同和種族型認同的邊界並不一定清晰。即便在同一社會中，民族認同的內涵也往往是不穩定、具流動性的，其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以及處於這種歷史情境中的社會角色（尤其是社會精英）所作出的闡釋<sup>⑩</sup>。因此，作為分析工具，傳統的靜態兩分法並不足以描述民族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sup>⑪</sup>。

為了反映民族認同的動態本質，我們採用歷史學家齊默 (Oliver Zimmer) 的理論模型，將某一特定時刻人們建構民族認同的「邊界機制」(boundary mechanism) 與所使用的「象徵性資源」(symbolic resources) 區分開來<sup>⑫</sup>。邊界機制是指社會角色在某一特定時間界定和建構自己身份邊界的過程；而象徵性資源則是指在建構這種邊界時所利用的要素。在整個過程中，人們往往需要一個參照對象——即「他者」，從而界定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說，身份認同的過程就是一個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劃出界限，避免彼此混淆的過程<sup>⑬</sup>。齊默指出人們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邊界時通常有兩種不同的認同機制：(1)「志願型邊界認同機制」(voluntarist boundary mechanism)：這種機制認為自己與「他者」之間的邊界是可以自主選擇的。民族認同依賴於個體意志，即民族是人類的主觀意志與行動共同作用的產物；(2)「有機型邊界認同機制」(organic boundary mechanism)：這種機制認為民族認同不由個體意願決定。民族是共同歷史、固有領土、種族等要素相互結合後的自然呈現，這些因素是先於個

體意識而存在的。前述的「公民型/種族型」靜態兩分法通常將「種族」和「領土」要素歸入種族型一端，將「政治」和「經濟」要素歸入公民型一端，而「文化」要素則介於兩者之間。有別於上述的傳統分析框架，我們認為，在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象徵性資源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既可以與志願型機制結合，也有可能與有機型機制結合，本身並不固定。正是象徵性資源與邊界機制的不同組合與不斷變動，才形成了民族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

至於哪種邊界機制與象徵性資源的組合能主導身份建構過程，除了受限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人口構成、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等），亦受到作為參照對象的「他者」影響。鑒於不同時代的社會運動所針對的「他者」不同，因此，不同象徵性資源和邊界機制對於區分「我們」與「他們」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也會有所不同，社會運動者也就有可能根據某一場運動的具體需求來建構民族身份。簡而言之，針對不同的「他者」，民族身份的定義亦會隨之調整<sup>⑭</sup>。因此，在下文討論中，我們集中關注「種族」、「領土」和「文化」這三種在傳統分析中常被視為先天決定的象徵性資源，如何在香港不同時代的社會運動中影響着「中國人」的含義。

其實，在既有的香港政治研究中，學生運動<sup>⑮</sup>和民族認同與本土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愈來愈受學者關注<sup>⑯</sup>。但是關於學生運動的研究大多把民族認同當作一個靜態概念，很少討論這個概念自身的演化；而關於民族認同的研究則通常把社會運動當作分析身份認同的社會背景，鮮有研究關注這兩者在近幾十年間是怎樣共同演化的。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的很多社運研究已經表明社會運動和身份認同之間存在一種互為激勵的機制<sup>⑰</sup>，即身份認同是運動爆發的誘因，而運動的結果也同時改變了身份認同。因此，本研究以學生運動為稜鏡，系統性地考察民族認同在香港幾十年來的變遷，試圖整合這兩條研究脈絡來討論香港年輕人的中國觀。

## 二 在社會運動中變遷的民族認同

自1960年代起，香港學生運動先後經歷了啟蒙期（1960年代）、「火紅年代」（1970年代）、沉寂期（1980年代）、新社會運動期（1990年代）、後回歸期（1997-2008）、復興期（2009-2014）和青年參政（2015-）七個階段<sup>⑱</sup>。在這幾個階段中，學生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和學生運動的發展相輔相成。以下首先描述三個領域的學生運動——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和近年來的港陸爭議。這三大領域的學生運動不僅跨越不同時代，而且與我們着重關注的三大象徵性資源——種族、領土和文化——息息相關。

### （一）中文運動（1968年至2010年代）

中文運動最早是指香港學界為了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提高中文地位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從1968年以來，香港經歷了三次因語言爭議而引發的社會運動，跨越了三個不同的時期，亦產生了不同的訴求和結果。

第一次中文運動發生在1968年。1960年代，為了躲避政治動亂，許多難民陸續從內地逃往香港。當時香港財富分配不均，社會福利有限，窮人的生活狀況很不理想。港英政府在這一時期奉行「不干涉主義」的執政方針，缺乏與民眾溝通的有效渠道。同時，香港的官方語言為英文，而本地居民則大多以廣東話為母語，語言問題進一步阻礙了官民交流。伴隨着社會矛盾加劇，專上學生率先發起了中文運動，要求港英政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並且在教育 and 公共行政事務上同時使用中、英文。他們認為政府對推廣中文的態度消極，這代表着殖民者的傲慢思維、對本地民意的忽視和對中國文化的冒犯<sup>①</sup>。經過持續數年的街頭抗議、請願、公眾講座和傳媒輿論，政府於1970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會先後出具四份報告書，支持學生訴求。1972年，政府成立了「中文公事管理局」，並於1974年發布《法定語文條例》，規定將中文列為香港官方語言之一<sup>②</sup>。

第二次中文運動開始於1978年。儘管第一次中文運動獲得了一定成功，但是社會上崇英抑中的現象仍然嚴重。此時政府發表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再次引發學生不滿。《白皮書》規定：學生若投考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前者需中文或英文及格，而後者僅需英文及格<sup>③</sup>。在許多師生看來，這項規定實際上變相貶低了中文的地位，因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兩間大學學生會等多達三十四個團體組成「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發起了第二次中文運動。除了要求規定投考兩校者必須中文及格之外，還呼籲糾正崇英抑中的社會風氣，檢討香港語文教育政策，提高學生母語水平。然而，與第一次中文運動相比，此次運動成效較低。港英政府在1978年底同意更改投考兩校的資格，但並未理會師生的其他訴求。此後參與中文運動的學界人士愈來愈少，到1982年運動已接近停頓。

所謂第三次中文運動，並非由學界或官方命名，而是媒體在報導1999年以來的「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爭議時，參照前兩次中文運動所採用的名稱<sup>④</sup>。該運動與前兩次中文運動的巨大差別是，其重點不再是中、英文之爭，而是普通話與粵語之爭。在這一時期，英文作為教學語言，尤其是作為中學授課語言，受到許多學生與家長的推崇。早在1997年回歸之初，香港教育署（現稱教育局）以「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sup>⑤</sup>為由，提倡香港公立中學以中文（粵語）為基本教學語言<sup>⑥</sup>。這項政策遭到了部分學校、家長及商界人士的反對，教育署於是設立了申請機制，允許部分中學仍舊以英文授課。由於家長爭相將子女送入英文中學就讀，很快出現了中文中學的新生名額難以招滿的現象<sup>⑦</sup>。至於普通話教學，香港政府在1999年便有了相應規劃，當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公布〈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提出要「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sup>⑧</sup>。這一規劃在2008到2014年推行的「普教中支援計劃」中真正得到實現。在政府扶持下，推行「普教中」的中學數目迅速增長，但同時亦引發巨大爭議。有家長及學生認為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影響學習效果，亦降低了粵語在社會中的地位，媒體對此亦頻繁報導<sup>⑨</sup>。更有人認為，「普教中」實際是把香港「漸漸建構成中國一部分的其中一步」，是一種「新

殖民霸權」<sup>28</sup>。在支援計劃結束後，「普教中」的熱潮逐漸回落，實施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學校數目開始減少。目前，普粵之爭仍在持續，至於未來將會出現甚麼情況，還有待繼續觀察。

## (二) 保衛釣魚台運動 (1970 至 1990 年代)

自 1970 年代起，中日兩國為釣魚台（島）的歸屬問題產生過多次爭議，每次爭議皆引發兩岸四地乃至世界華人一系列「保衛釣魚台」的抗議活動。其中香港學生在 1970 年代首次保釣運動中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引人注目，與二十年後其後輩的取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1970 年代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黃金時期，又被稱作「火紅年代」<sup>29</sup>。在這一時期，由於港英政府意識到與市民之間存在溝通障礙，於是在民政管理中採取了「協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的方式，較多地回應民眾的訴求<sup>30</sup>。制度改革與隨之改善的社會服務緩和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也讓以下問題列入了學生的議程：對未來的香港而言，究竟是回歸中國更好，還是維持現狀更好？兩種方案的支持者皆大有人在，而這種有關香港未來的路線分歧不僅為這一時期的學生運動奠定了基調，亦意味着「中國人」這一民族身份與正在形成的「香港人」身份之間產生潛在矛盾。

第一次香港學生保釣運動爆發於 1970 至 1972 年。針對美國將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行政權移交日本的決定，學生先後組織了多場抗議示威，並提出「愛國保土」的口號。這些抗議運動遭到港英政府的鎮壓，過程中有多名學生受傷、被捕及被檢控。該事件大大刺激了學生反殖愛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回歸中國」懷有期待的人愈來愈多。

第二次保釣運動出現在 1990 年代中期。當時香港本地製造業大多已遷往中國內地，而香港逐漸自我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隨着經濟結構轉型，人們的價值觀也出現明顯變化。當社會經濟愈趨發達時，人們對於經濟、人身安全和溫飽問題的擔憂會逐漸減弱<sup>31</sup>。同時，又因為受到 1980 年代末國內政局和香港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消極影響，香港學生對中共反感卻又無能為力，逐漸產生了「去政治化」的傾向。當時的學生運動大多轉為關注出現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即時、微觀的議題，諸如環境保護、性別歧視、校園性騷擾等等。因此，當 1996 年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1970 年代曾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保釣運動中學生組組長，亦是「國粹派」骨幹）在釣魚台海域跳海示威不幸溺亡、激發又一波港台保釣風潮時，香港學生的反應十分冷淡。向來被視作學生運動發源地的港大校園冷冷清清<sup>32</sup>，甚至有學聯常委表示，「釣魚台事件，至今仍未能從歷史上找出主權屬誰的答案」<sup>33</sup>。

## (三) 港陸爭議 (2000 至 2010 年代)

自 2000 年開始，香港學生運動在長久沉寂後逐漸復興。當回歸後港陸兩地接觸與融合的「興奮期」過去以後，雙方似乎開始經歷「七年之癢」，進入了

摩擦與矛盾的「集中爆發期」。這個時期的學生運動融合了政治、民生、教育、文化和經濟問題等議題，香港社會開始呈現兩極化與撕裂狀態。

2003年的「反二十三條立法」運動是香港學生運動復興的開端。由於香港政府頒布〈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要求對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土等罪行進行明確立法，許多民間團體開始質疑新法例可能對香港公民社會的人權與自由有所限制。2003年7月1日，四十四個公民社會團體共同組織了一場大型遊行抗議。約五十萬遊行中，學生的比例達17.6%（誤差±1.5%）<sup>⑳</sup>。自此之後，每年7月1日不少香港人都會遊行抗議、表達訴求，極大地增強了年輕一代參與政治的意識。如果說「反二十三條立法」運動代表了香港人進一步加深對北京政府的不信任，那麼同時期「自由行」計劃的開展<sup>㉑</sup>，則為香港人與內地民眾之間產生矛盾埋下伏筆。隨着赴港旅遊人數大幅上漲，內地遊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為和新移民佔用公共資源的情況在媒體上大量曝光<sup>㉒</sup>，反內地的情緒逐漸在香港人中蔓延。2008年北京奧運會促成民族認同的小高潮之後，香港青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程度一降再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從2009年上半年的35.6%增加至2017年同期的65%，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從22.7%減少至3.1%，認同「混合身份」的則從41.8%減少至28.7%（圖1）。

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更加凸顯了香港年輕人所面臨的民族認同困境。「80後」年輕人成為反對廣深港高鐵建設的主要參與者。他們擔心高鐵工程存在許多隱患，比如影響高鐵沿線居民正常生活、工程花費過大、路線規劃不合理、損害社會公正等。除此之外，反對者還擔心香港與深圳、廣州的深度經濟融合會使得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廣深港高鐵的興建不只是一個基建問題，也是一個關乎香港與香港人是甚麼的問題。」<sup>㉓</sup>

到2012年前後，隨着港陸矛盾的進一步加深，香港爆發了一系列針對內地人的抗議事件，比如「D&G事件」和「蝗蟲廣告事件」<sup>㉔</sup>。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更從政治和教育層面深化了香港的身份認同危機<sup>㉕</sup>。當時，香港政府計劃在全港中小學開展「國民教育」，意在「培育學生的品德與國民素質，以及於不同範疇的身份認同……從而奠定個人成長的堅實基礎，培養國民素質，並提高學生對國家、國情和中華文化的了解，對國家和民族產生認同和歸屬感」<sup>㉖</sup>。這種建立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嘗試很快遭到主要由「90後」中學生組成的團體「學民思潮」的抵制。學民思潮將國民教育視為「洗腦」教育，並聯合其他社會團體發動了歷時一年的抗爭，包括一場約九萬人的抗議遊行和一場約十二萬人的集會，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永久擱置」推行國民教育。

2014年的「雨傘運動」則進一步將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危機推向了頂點。從9月初學聯及學民思潮組織的罷課開始，「雨傘運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和各個社會組織參與。抗議者先後佔領了金鐘、旺角、尖沙咀等地幾條主要街道，試圖以此迫使政府改革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制度。運動持續七十九天，最後約有一千名參與者被逮捕。雖然其訴求並未能達成，但「雨傘運動」令世界媒體的聚光燈集中於香港，引發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未來的討論與爭議。

綜上所述，這三類學生運動——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和港陸爭議——跨越了不同時代，動用了不同的象徵性資源，構建運動訴求和動員策略。同時隨着運動的發展，學生所認同的「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含義本身也隨之演變。因此，我們在下一節進一步分析身份認同與學生運動的相互演化建構的過程。

### 三 有機型與志願型機制對種族、領土、文化的理解

如前所述，民族認同由多種象徵性資源在不同的認同機制下共同構成。在上述的學生運動中，鑒於發生領域和運動訴求的不同，學生利用了不同的象徵性資源來建構他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而對同一種象徵性資源，隨着社會結構以及身份參照對象的變化，學生又在不同階段採用了不同的認同機制來詮釋。這個程序重塑了不同階段的「中國人」含義。此外，一場運動的結果又促使學生更新對「中國人」身份的理解，而這種更新後的身份認同則為下一波社會運動重新設定了方向與策略。因此，香港學生運動與民族認同構成了一個交互系統：它們互為彼此的誘因與結果。以下將分析種族、領土與文化三種象徵性資源如何與邊界機制相結合，在不同領域的學生運動中建構學生的身份認同，並左右了學生運動的結果。

#### (一) 種族

「種族」即「一個已被命名的，承載着共同的祖先神話、歷史記憶以及一個或多個共同文化元素，與故鄉相聯繫，且至少其部分成員擁有團結意識的人類族群」<sup>①</sup>，是民族形成的基礎。在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族群往往是一個象徵性概念，它來自社會精英與大眾媒體宣傳之後的共同想像，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並無太大關聯。但是它卻自然而然地區分出了「我們」與「他們」，因而成為建構民族身份的重要部分。

1960年代，香港華人生活貧困，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華人對港英政府的強烈不滿，因而「中國人」這一身份的主要參照對象是「英國人」，更多是一個族群概念。在「六七暴動」期間，親共報紙曾屢次提出：「英帝是中華民族敵人，在侵略反侵略鬥爭中，不投降就淹死。」<sup>②</sup>作為「我們」與「他們」最大的區別，中國身份中的種族要素就成為了學生運動的宣傳重點。對當時的學生而言，民族身份是一種自然的、先天的有機建構，即由種族血脈和傳統決定，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在1968年的中文運動中，學生將其運動訴求與種族平等的概念聯繫到一起，突出語言（中文）與種族不可分割的聯繫，強調中文運動的本質是為了反抗種族不平等。比如，香港中文大學1967年12月出版的《崇基學生報》曾直指港英政府不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是一個民族輕視另一個民族<sup>③</sup>。學聯亦在其發布的〈學聯就中文研究問題之立場書〉中這樣宣稱：「香港的中國人除了佔香港人口壓倒性的大多數——98%——外，對香港

繁榮發展的貢獻亦極大。故此，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相信中國人的母語應得到被尊重的地位。」「語文是情感所繫……把一種族群體的語文列為法定是一種尊敬的表現。由是，要求把中文列為法定語文是不容否認的政治權利。」<sup>④④</sup>當時媒體亦有相似表述：「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使用中國語文的華人，在中文被確定為第二官方語言後，將可減少許多官民隔閡，和某些人們認為港府『重英輕中』的心理。」<sup>④⑤</sup>「只是注重英文而輕視中文，是一種淺見，東方人可以學懂西方的語言，西方人也是智慧的，也可以學懂東方語言。」<sup>④⑥</sup>

簡而言之，當時輿論認為，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是一個人口佔據絕大多數，然而政治無權、經濟貧窮、文化權利不受重視，各個方面皆受到英國殖民統治者不平等對待的種族群體。這種闡釋激發了香港華人同仇敵愾的意識，成功地吸引大批社會運動參與者與同情者。因此，中文運動不僅得到當時社會精英（如市政局議員）的支持，也吸引大批工人階層加入，成立了「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人學生聯盟」。在1970年的簽名收集活動中，更收集到三十萬個簽名支持運動，打破了當時的紀錄。

以種族為主要象徵性資源、採用有機型機制來建構民族身份，不僅是運動組織者在策略上的技巧，它的有效性還可反映於1960年代的香港人口結構。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報告，1961年在香港310多萬居民中，50.5%出生於中國內地，而47.7%出生於香港<sup>④⑦</sup>。前者有許多仍舊對中國懷有極強的歸屬感，香港對他們而言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避難所，還不是一個能稱作「家」的地方<sup>④⑧</sup>。

到了1970至1980年代的十年間，香港居民中在香港出生人口的比例穩定在56至57%，而內地出生人口下降到約40%<sup>④⑨</sup>。新一代出生的香港人漸漸擺脫了難民心態，對香港產生了休戚與共的責任感，並愈來愈關心本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上述的歷史條件變化促成了「香港身份」的誕生<sup>⑤①</sup>，也為民族認同的志願型機制創造了作用的條件：身份成為了一個可以藉由個人意志選擇的概念，即人們可以選擇成為中國人，也可以選擇成為香港人。1970年代學生運動中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便是兩種身份認同分歧的表現。1972年學聯的一名發言人就曾經表達過他的迷茫：「作為香港出生的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中國人，令我們陷入了一種尷尬境地，這也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sup>⑤②</sup>

改革開放之後港陸交流的加強，也使許多香港人真正認識到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差距。香港人與內地人遂有了你我之分，開始出現了早期的排斥情緒。這個時候的香港身份，實際上削弱了中華民族認同在社會運動中的動員能力，香港市民「愈來愈感覺到自己是有異於內地民眾的中國人。這一『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着一種不確定性：在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時，卻不認為民族主義可以凌駕於其他道德價值之上，也不會無條件地接受一切以國家為先」<sup>⑤③</sup>。

因此，到1978年第二次中文運動時，種族要素在學生運動中的動員力量明顯減弱。除了繼承第一次運動精神，要求提升中文地位、保護民族文化的呼聲之外，學生群體中亦出現了另一種聲音，即認為「中西結合」、「中英拌盤」才是香港特色，單方面強調中文的地位並無太大意義<sup>⑤④</sup>。與此同時，中文

教育持續萎縮，而英文教育興盛發展，已獲得更為廣泛的接受度。更高的英文水平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工作前景，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許多學生便將精力放在改善英文上<sup>⑤4</sup>。故而這一時期，對於更為務實、更強調本土價值的學生而言，「中國人」這一身份，尤其是其所暗含的種族意義便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在第三次中文運動中，「中一英」的種族之爭已經完全淡去，抗議者的訴求與方向發生了徹底的扭轉。隨着殖民時代的結束，英文已經不再具有「種族壓迫」的含義，而被徹底工具化，成為獲得更大經濟利益和更高社會地位的必要條件。與此同時，普通話取代英文，成為了本土語言粵語的「他者」。儘管回歸初期，能操流暢的普通話代表着與中國大陸市場更多的聯繫和工作機會，但在很多香港青年人的價值天秤中，這個外來的「他者」帶來的利益還遠比不上對本地族群被邊緣化、同質化的擔憂。尤其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廣「普教中」時，教育局曾宣稱：「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sup>⑤5</sup>該言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前兩次中文運動中，經過不斷努力才被推上「法定語文」位置的中文（實際指粵語），此刻因為普通話的國家定位而被冠以「方言」的名號，使許多香港人不僅感到粵語地位被貶低，更感到自身族群存在價值受到威脅。對他們而言，粵語承載的不僅僅是集體回憶、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更是在面對大陸同化時，確保整個族群獨特性的工具<sup>⑤6</sup>。而部分激進者更對「粵」或「廣東」這樣與香港具有天然聯繫的大陸元素產生了抗拒，試圖將其從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中分離出去，譬如《學苑》在其最終一期刊物中號召開啟一場「新文學運動」，要求將香港人講的話命名為「香港話」，將廣東歌命名為「香港歌」<sup>⑤7</sup>。

## （二）領土

「歷史性領土」或「故土」一直是構成多層面民族認同的要素之一<sup>⑤8</sup>。然而在香港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中，學生對領土的認同機制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1972年的保釣運動中，學生很明顯地採用有機型機制，將歷史性領土作為關鍵象徵性資源來進行動員。在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的大環境下，學生用以定義「中國人」的「他者」是「外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運動中，學聯就曾經登報聲明表達其領土認同：「中國必將統一，而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⑤9</sup>同時，在面向公眾的〈保衛釣魚台五·一三大示威告全港市民書〉中，學聯又呼籲：「保衛國土釣魚台是每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能逃避的責任。而美國竟於五月十五日把釣魚台管理權交於日本，這種狼狽為奸的行為，凡我同胞，不論年齡、職業、黨派皆應發出民族的憤怒。」<sup>⑥0</sup>部分學生把種族與領土視為「中國人」與生俱來的要素，即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天生擔負着捍衛領土的責任，而保衛釣魚台正是香港學生履行國民責任的具體體現。如其中一名參加者對整個運動的評價：「我親眼見到這偉大的場

面；親眼見到一班年青愛國、一股熱血的青少年，不畏艱辛、不怕暴力，為國家、為自己表現國民應有的天職。」<sup>⑥</sup>

然而在1996年的第二波保釣浪潮時，這種將中國身份認同與領土完整相結合的動員策略卻收效甚微。儘管1990年代初大部分學生仍然認同中國人的民族身份，並認為香港與中國的未來命運不可分割<sup>⑦</sup>，但是對於種族和領土的認同不再由單一的有機型機制主導。一方面，在人口結構上，1990年代初，香港出生的人口佔全港人口的比例穩定在60%左右，遠超過內地出生的比例<sup>⑧</sup>；同時，1970年代第一批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已經成長，「香港人」亦開始成為了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身份。另一方面，這批香港年輕人採用一種較重批判的方式來看待中國民族主義；同時，他們不認可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卻又無力進行有效抗爭，使得他們只能用身份認同來表達政治立場。政治因素成了影響身份認同的重要象徵性資源，這就為志願型機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學生開始要求擁有對民族身份的定義權和選擇權，比如刊載在1989年9月《理大學生報PolyLife》的一篇評論中，作者就對傳統的愛國主義提出質疑<sup>⑨</sup>：

我對自己下了一個結論：「我不愛國」，又或者換句話說是我根本不認同世俗對國家、民族、愛國所下的定義。……我想問，「民族」、「國家」、「愛國」對於我們去理智解決問題，又有甚麼幫助？當個人的價值不能受到認同時，「民族」、「國家」、「愛國」這些概念又有甚麼意思？……我希望新加入民主運動的同學要清楚知道愛國的定義是因因人而異的，但肯定不是上街遊行或者唱「龍的傳人」這麼簡單。希望大家能夠用理智處事而非只有一腔熱誠而亂闖。而我亦決定繼續做一個世俗眼光下的賣國賊。

一旦民族身份可以自主定義和選擇，那麼種族和領土這些先前被有機連接在「中國人」身份裏的象徵性資源也就不再固定了。在1996年的保釣運動中，有學聯成員拒絕承認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也有成員自我辯護說：「民族主義已不再重要。」<sup>⑩</sup>這體現出學生開始背離傳統的有機型機制，轉而產生對領土認同的不同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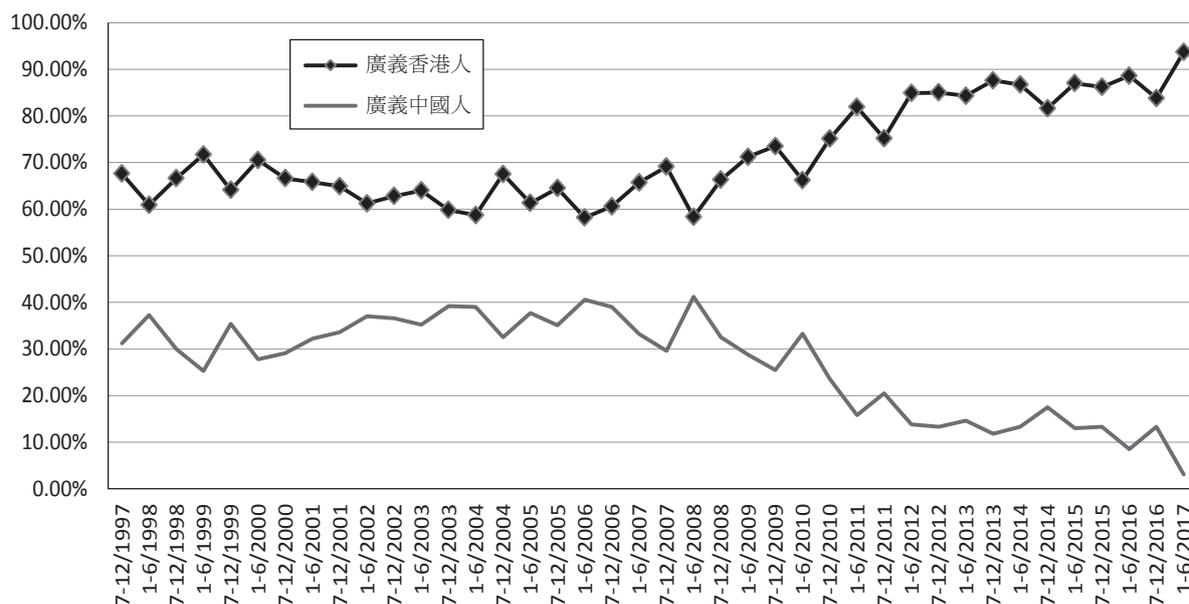
學生對第二波保釣運動的冷漠態度預示着「中國人」身份認同開始進入危機。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延緩，而樓價下跌和失業率上升則加劇了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不滿<sup>⑪</sup>。從1997年算起，香港平均每年發生2,200起公共集會或遊行<sup>⑫</sup>，這使得香港一度被《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等外媒稱作「抗議之城」<sup>⑬</sup>。這一時期的學生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要多於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從1997到1999年，在香港青年(18至29歲)居民中，從廣義而言約65%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僅30%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圖2)。

1980年代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騰飛提升了「香港人」身份的競爭力。相對於「香港人」而言，「內地人」窮困、「老土」、落後，但那時無論香港人還是內地人，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血脈相連的。但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本土元素開始凸顯，「香港人」身份被圈定在香港這一片土地上。強調

香港人視角、香港主體性，既可以看作中英角力過程中香港人長期失語後的自然反彈，又可以看作面臨政治劇變時香港人對自己的重新審視<sup>⑨</sup>。此時，香港與內地兩個群體被一條深圳河區隔開來，「中國人」的身份被詮釋為代表着大中華情結與大中國民族主義，同時亦意味着對香港本土文化歷史的貶低和邊緣化。因此，它不再是血脈上的含義，而成為了香港本土身份的參照對象，除了「內地」，更是「非本土」與「外來」的。

事實上，香港人如何稱呼「中國」隨着時間有所變化。香港官方的慣例是使用「內地」，而香港民間則是「內地」和「大陸」混用。這兩個詞的使用以及其背後所暗示的內涵受到地理、政治以及台灣的影響。第一，從地理上看，香港與中國大陸相連，早期的移民又多來自廣東鄉下，故稱中國為「內地」。早期移民到來的「內地人」大都是「鄉下人」，是香港人的窮親戚。第二，這兩個詞所暗指的政治內涵不同。從1959年開始，《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早已經建立了在對台問題上使用「大陸」，在涉及香港澳門問題上使用「內地」的政治傳統。新華社在2015年11月頒發的《新華社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中更是明確規定「台灣」與「祖國大陸」為對應概念；「香港、澳門」與「內地」為對應概念。不得將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並列提及，如「中港」、「中台」、「中澳」等<sup>⑩</sup>。也就是說，「內地」與「大陸」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更加暗示了「香港屬於中國領土」的政治含義。因此，內地媒體和香港官方使用「內地」，以表明對「一國兩制」體制的支持。而民間對這兩個詞的混用，既有普通市民對這種隱含的政治涵意漠不關心的原因，也有藉此區分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之意。第三，這兩個詞在香港的分化還受到了台灣的影響。這兩個詞在台灣爭議很大。前文化部長龍應台認為，在日據時代，台灣稱日本為「內地」暗示着台灣是

圖2 1997至2017年香港青年(18至29歲)的身份認同(廣義香港人/廣義中國人)



數據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市民的身份認同感〉，香港大學民意網站，[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http://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

日本的一部分，是日本內地自然的延伸，所以具有「一體」的含意。因此，她認為台灣人應該稱中國為「大陸」而非「內地」<sup>㉑</sup>。香港人如果稱中國人為「內地人」，也是潛意識地承認香港是「內地」的延伸——這正是當下興起的激進本土派所反對的態度。因此，「內地」與「大陸」，或者「內地人」與「大陸人」，這兩組詞除了所指向的地理位置的差異，「內地」較「大陸」更具有暗示中國和香港是一體、不可分的含意。「中國人」在不同世代的香港年輕人中，從一個「鄉下人」，變成早期的「內地人」，到回歸後的「大陸人」，再變成下一節中所論述的「強國人」。

### (三) 文化

「文化」不僅僅是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本身就在社會運動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是解決問題的工具箱、抗議劇碼的腳本、理所當然的程式，甚至是本能<sup>㉒</sup>。如前所述，在2003年「自由行」計劃開展之後，赴港內地遊客人數大幅上漲。內地遊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為在媒體上大量曝光。此外，新移民對香港的各種公共資源的佔用，如交通、醫療服務、社會福利和教育，更激起了香港人的反內地情緒。這一時期，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程度更低。從2010年開始，18至29歲願意從廣義上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從33.3%穩步下降到2017年的3.1%，而認同「香港人」身份的則從66.2%上升到93.7%（圖2）。前述於2012年發生的一系列港陸爭議中，「中國人」的身份已經被具象成「大陸人」，進而演變為「強國人」。也就是說，在「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文化想像裏，來自大陸的「強國人」人數眾多，他們雖擁有強大購買力，但喜好炫富、不遵守異地禮儀、規則，且政治文化理念與「香港人」相左。

與以前香港的身份認同衝突不同的是，2010年之前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融合與衝突大都局限在香港本地；而2010年之後的港陸之爭，卻同時引發了深圳河以北的「大陸人」的「反擊」。不僅在香港的內地學生參與到論戰中，內地的知識份子和民眾也在網上開始發文，把香港人稱作「英奴」、「港燻」。2012年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接受採訪時更稱「香港人是狗」，引發一波激烈的港陸罵戰。而「雨傘運動」之後，由於產生了香港不穩定、排外的印象，報考香港院校的內地本科生數目銳減，其中受影響最大的院校（嶺南大學）跌幅達40%<sup>㉓</sup>。

這個時期的身份認同衝突更加凸顯了兩種邊界機制針對文化這一象徵性資源的不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不僅展示着祖先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也是構成人們自身精神氣質的重要基石。在許多早期社會運動中，西方文化往往是香港學生進行自我定義的參照對象。為了有效地凸顯和鞏固自身「中國人」的獨特性，又要區別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思潮，中國傳統文化自然而然被香港人視作精神文化根源，構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國族主義<sup>㉔</sup>。因此，在當時傳統文化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且自然的構成部分，幾乎內化為本能。

即使在香港回歸以後，年輕人仍然對傳統文化保持高度認可，如2003年一項調查顯示，76.8%的青少年表示珍惜中國文化，其中又有56.8%認為中國文化幫助他們豐富了精神生活<sup>⑤</sup>。然而，這種有機的、與民族認同息息相關的文化僅僅局限於中國傳統文化，它更多地停留在學生的想像裏，而非學生的實際生活中。周華山曾這樣描述道：「香式民族情懷其實只是一種很抽象的『中國心』。香港人沒有自己國家，沒有認同的中『國』……我們只有一份很抽象的民族認同——沒法落實於任何國家。社會文化上，我們對『香港』的認同遠遠比『中國』強烈。感情上我們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喜歡大陸的名勝風光、古蹟文物，但始終感到不屬於這個社會，更不願意生活其中。」<sup>⑥</sup>

而在香港回歸之時，年輕人的眼光早已轉向現代文化。當他們以現代的香港與改革開放早期的中國大陸做比較時，他們所模糊感知且久遠的中國傳統就不足以解釋「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差別，更不足以用來支撐自己的身份選擇。他們逐漸發現，儘管同樣屬於「中國文化」的大範疇下，但香港文化與大陸文化仍大相逕庭。尤其自從1980年代開始，香港大眾媒體開始不斷展示各種本地經驗和熱點，逐漸凝聚成一種獨特的「港式生活」圖景<sup>⑦</sup>。在電視與廣播節目中反覆呈現的生活方式、規範常識、意識形態以及系統性話語促進了本土意識的形成，而這為「香港」做出了除經濟層面之外的其他定義<sup>⑧</sup>。同時，強調港陸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源自香港人一種自我防禦的心理機制：1980年代中期《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將香港人放在了一個複雜的位置——他們既不再受英國政府的庇護，又無法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給予信任。未來的不確定性激發了嚴重的焦慮與恐慌，很多香港人不願意僅僅被貼上「中國人」的標籤，而愈發希望能標示出他們的獨特性<sup>⑨</sup>。

這種強調香港人視角、保護香港特色的本土主義思潮在早期尚未包含明顯的排外情緒，它是開放的，並不排斥非土生土長的外來者，認為「任何人只要立志將香港當成唯一安身立命的城市，放棄上一代人用腳投票（移民）的投機心態，就是本土派」<sup>⑩</sup>。這種「開放本土派」的思潮在2007年保護皇后碼頭的一系列抗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但隨着中國大陸迅速發展，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受到愈來愈大的衝擊。尤其是2010年前後「雙非孕婦」、「自由行」等現象引發的不滿已經積累至頂峰，使得新一代香港年輕人萌發了更加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開放本土派」的地位逐漸被具有明顯排外意識的「土著本土派」所取代。後者認為「只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才是本土派」，「香港土著天生就愛港的，跟天生就不愛港的新移民是水火不融的兩個族群」<sup>⑪</sup>。香港人不再是香港人，而是「香港族」<sup>⑫</sup>。因此，「土著本土派」更要強調如何區分「我們」與「他們」，強調「香港人」與「大陸人」的不同。如2016年，曾任學民思潮發言人的黃子悅在《蘋果日報》登載文章，闡述了他們這一代學生運動者對民族認同的理解，頗具代表性：「台灣歌手羅志祥近日的名言：『不用分那麼細，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是絕對不同意的。在本地層面而言，無論是文化，如廣東話，抑或價值觀等，都有很大差別。在國際層面上，雨傘運動令國際意識到香港人跟中國人有明顯分野。對於我自己而言，這也是個尊嚴的

捍衛，捍衛自己的身份、文化、價值，是不可能以『不用分那麼細』或中英翻譯問題為藉口。我們就是要分那麼細，就是要守護這一小片淨土。」<sup>③</sup>

香港人探尋自我的歷程結合了長期存在的對中國內地政治的排斥，逐漸演變成對一切內地事物的反對與歧視，更被部分人描述為「城邦自治運動」<sup>④</sup>。「香港人」徹底地從「中國人」這個身份中抽離出來，對香港人而言，「香港就是本土，內地就是他者，但這裏的他者並不邊緣，而是財大氣粗力拔山兮。反之香港才是那告急、憤怒、冤屈、反撲的主體」<sup>⑤</sup>。因此，當大陸成為一個強勢的「他者」時，對「中國人」身份的猶豫，以及強調對現代文化的自主選擇，本質上反映了香港年輕人對如何圈定自我在文化上的獨特性，避免被一個強勢的「他者」同化的焦慮。在這樣的過程中，「種族」、「領土」和「文化」這三種在傳統分析中被簡單視為先天決定的象徵性資源，在不同階段和類型的香港學生運動中，分別與不同邊界機制結合，塑造了香港青年的中國觀。

#### 四 結論

通過梳理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香港學生在不同議題領域的社會運動，本研究分析和討論了民族認同的變遷以及其對學生運動的影響。有別於傳統的研究民族認同的靜態二分法（「公民型/種族型」），本研究以學生運動為稜鏡，關注民族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認為個體身份的建構與想像，不僅取決於人們依靠何種要素（即「象徵性資源」），更取決於人們如何借用此種象徵性要素來劃分自己與「他者」的邊界（即認同的「邊界機制」）。志願型機制的認同過程強調個體意志，認為個體有權利選擇，因此民族身份是個體主觀意識和行動的共同產物；而有機型機制的認同過程則強調先天性要素，認為民族身份不由個體意願決定。我們認為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是認同的邊界機制與象徵性資源在不同社會結構下共同作用的結果。

針對從1960年代到2010年代三大領域的香港學生運動——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和港陸爭議，本文着重分析三種象徵性資源——種族、領土和文化——在建構香港學生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中的作用。這三種象徵性資源在傳統二分法分析框架裏經常被歸入種族型民族認同的類別。但是本研究發現，學生如何認知種族、領土和文化取決於他們運用何種邊界機制。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根據某一具體社會運動的訴求，運動組織者使用哪種邊界機制進行動員，很大程度取決於其所針對的目標對象，即「他者」的身份。當作為參照對象的「他者」來自異質文化時，學生傾向使用有機型機制來定義他們的「中國人」身份；而當「他者」來自同質文化時，志願型機制更為普遍應用。前一場學生運動的結果通常引導學生對其「中國人」身份進行重新定義，而這種再定義又影響着下一場運動的訴求與方向。

因此，「中國人」的含義在每一代香港年輕人中不停變化。在1960年代，「中國人」是相對於作為統治者的「英國人」、飽受歧視與壓迫的「本地弱勢族群」；1970年代的「中國人」是隔岸相望、追求統一、反抗外辱的「中華民族」；

1980年代的「中國人」是「內地人」也是「香港人」，但兩者卻隔着一條政治鴻溝；1990年代到2000年代末的「中國人」僅是「大陸人」，是新移民，是與「香港本地人」不同或相對的「他者」；而到了2010年代，「中國人」變成了「強國人」，是具有強大購買力但政治文化理念與「香港人」完全相左的強勢「入侵者」。換句話說，當矛盾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間（比如中國 vs. 外國）爆發，有機型邊界更有可能被採用；而當矛盾在兩個相似的文化族群之間（比如大陸 vs. 香港）爆發，志願型邊界就更有可能成為主導機制。

簡而言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並不是由身份本身導致的，因為從本質上來看，身份本身就是一個流動的、不穩定的概念。身份認同隨着歷史環境而變化，並由當下社會中的不同社會角色，尤其是社會精英的詮釋而變化。當社會結構條件不斷改變時，人們對自身的認知不能相對應地進行自我更新，或兩個不同的族群之間採用不同認同機制認知和建構身份時，身份危機就會出現。

### 註釋

① 該統計數字為筆者根據香港警務處《統計數字公開守則》，直接由公開資料主任處獲得。資料索取途徑參見 [www.police.gov.hk/ppp\\_sc/09\\_statistics/as.html](http://www.police.gov.hk/ppp_sc/09_statistics/as.html)。

② 在指向「中國」時，香港官方使用「內地」，香港民間則時常交替使用「內地」與「大陸」。但是這兩個詞所暗示的內涵有所區別，其使用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詳見本文第三節）。簡要說來，這兩個詞除了所指向的地理位置的差異，「內地」較「大陸」更具有暗示中國和香港是一體、不可分的含意。因此，本文在下面分析過程中，區別使用這兩個詞：如果是一般性描述陳述事實，本文採用官方慣例；如果是引用既有文章，在所論述的情境中包含了所描述對象的價值判斷，本文將根據情境區分使用這兩個詞。同樣原則適用於「內地人」與「大陸人」。

③ Thomas L. Friedman, "The Square People, Part 1", *The New York Times*, 3 May 2014, [www.nytimes.com/2014/05/14/opinion/friedman-the-square-people-part-1.html?rref=collection%2Fcolumn%2Fthomas-l-friedman&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opinion&region=stream&module=stream\\_unit&version=search&contentPlacement=4&pgtype=collection](http://www.nytimes.com/2014/05/14/opinion/friedman-the-square-people-part-1.html?rref=collection%2Fcolumn%2Fthomas-l-friedman&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opinion&region=stream&module=stream_unit&version=search&contentPlacement=4&pgtype=collection); Alice Y. L. Lee, Klavier J. Wang, and Ka-wan Ting, "Quest for Free Expression from Hong Kong Net Gener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with Digital Media", ICA Regional Conference (Brisban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3 October 2014).

④ Ernst B. Haas, "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no. 3 (1986): 709.

⑤ 廖美香：〈香港觀察：香港，中國人不再為妳瘋狂〉（2014年8月5日），BBC中文網，[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4/08/140805\\_hkreview\\_economy](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4/08/140805_hkreview_economy)。

⑥ Lewis 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 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⑦ 我們同時與學生運動參與者、媒體記者及學者進行了二十二場深度訪談，每場訪談持續約1.5至2小時。

⑧⑧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14; 14-15.

⑨ Colin Clark, "Civic and Ethnic Dimension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thnic Conflict*, 2d ed., ed. Karl Cordell and Stefan Wolff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44-54; Michael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Vintage, 1994); Eric Kaufmann and Oliver

Zimmer, " 'Dominant Ethnicity' and the 'Ethnic-Civic' Dichotomy in the Work of A. D. Smith"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no. 1-2 (2004): 63-78;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⑩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⑪ David Brown, "Are there Good and Bad Nationalisms?"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5, no. 2 (1999): 281-302; Eric Kaufmann, "The Lenses of Nationhood: An Optical Model of Identity"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 no. 3 (2008): 449-77; Tim Nieguth, "Beyond Dichotomy: Concepts of the N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embership"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5, no. 2 (1999): 155-73。

⑫ Oliver Zimmer, "Boundary Mechanisms and Symbolic Resources: Towards a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to National Identity"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9, no. 2 (2003): 173-93.

⑬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61), 58.

⑭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 no. 4 (1998): 593-612.

⑮ Benjamin K. P. Leung, "Social Movement as Cognitive Praxis: The Case of the Student and Labour Movements in Hong Kong" , in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Power, Protest, and Change in a Dynamic Region*, ed. Jeffrey Broadbent and Vicky Brockman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11), 347-63; Benjamin K. P. Leung,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to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Real and Financial Linkag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Currency Union*, ed. Stephen Wing Kai Chiu and Tai Lok Lu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3-15; Stephan Ortmann, "Hong Kong: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 , in *Student Activism in Asia: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lessness*, ed. Meredith L. Weiss and Edward Aspinall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79-100 ; 蔡子強等 : 《同途殊歸 :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 (香港 : 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 1998) 。

⑯ Abanti Bhattacharya, "Chinese Nationalism Contested: The Rise of Hong Kong Identity" , *Issues and Studies* 41, no. 2 (2005): 37-74; Elaine Chan, "Defining Fellow Compatriots as 'Others'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5, no. 4 (2000): 499-519; Ming-kwan Le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 in *The Hong Kong-Guangdong Link: Partnership in Flux*, ed. R. Yin-Wang Kwok and Alvin Y. S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9-32; Eric Ma and Anthony Fung,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 ,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no. 2 (2007): 172-85;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3 (1997): 3-13; Gordon Mathews, Eric Ma,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⑰ Barbara Epstein, *Political Protes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tanfor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Jane Mansbridge, "What is the Feminist Movement?" ,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ed. Myra M. Ferree and Patricia Y. Marti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34; David S. Meyer and Nancy Whittier,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 *Social Problems* 41, no. 2 (1994): 277-98; Francesca Polletta and James M. Jaspe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no. 1 (2001): 283-305.

- 18 F. Lin and S. Lin, "Being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udent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13 August 2016).
- 19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3），頁 12-14；172-75。
- 20 學者關於「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時間的說法各有不同。有人認為是在：（1）1968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 13）；（2）1970年（郭少棠：〈從「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到「第二次中文運動」〉，載鄭宇碩編：《八十年代的香港：轉型期的社會》〔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1〕，頁 61-68）；（3）1971年（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第 6 期〔2015 年 3 月〕，www.thinkinghk.org/v602）。綜合其他文獻，本文採用 1970 年。此外，1972 年成立的「中文公事管理局」主要推動和執行「在公事上使用中文」（郭少棠：〈從「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到「第二次中文運動」〉，頁 61-68），但也有其他文獻認為該局成立於 1970 年 10 月（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128）。
- 21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2），頁 364。
- 22 陳智德：〈第三次中文運動〉，《星島日報》，2014 年 4 月 14 日。
- 2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為甚麼要用母語教學？〉（2011 年 12 月 2 日），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secondary/moi/key-events-moi-fine-tuning-bg/moi-guidance-for-sec-sch/sep-1997/mother-tongue/index.html。
- 24 教育署：〈中學教學語言指引〉（1997 年 8 月），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092985.126171/1.HTML。
- 25 香港中學校長會：〈1998 年升中派位問卷調查報告〉，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香港中學校長會提交的意見書〉（1999 年 4 月 19 日），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ed/papers/1713c02.pdf，頁 1-2。
- 26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1999 年 10 月），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holistic-review/index.html。
- 27 陳綺雯、馬婉婷：〈港府推行「普教中」八年，為何父母仍憂心忡忡？〉（2016 年 11 月 28 日），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128-hongkong-chinese-education/。
- 28 譚樂基：〈從普教中看新殖民霸權〉（2014 年 4 月 27 日），獨立媒體，www.inmediahk.net/node/1022550。
- 29 Linda Butenhoff,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22-27.
- 30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2-96.
- 31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71。
- 32 〈港大太古橋上「六四」風波未平 鄭耀宗：決不容許違規行為〉，《星島日報》，1996 年 9 月 14 日。
- 33 〈學聯代表太無知〉，《星島日報》，1996 年 9 月 23 日。
- 34 〈七一遊行 2003〉，香港大學民意網站，www.hkupop.hku.hk/chinese/platforms/20030701/freq.html。
- 35 「自由行」計劃開始於 2003 年 7 月 28 日。該計劃允許內地遊客前往香港及澳門進行個人旅遊。在此之前，內地遊客僅能通過團體旅遊或商務簽證到達港澳地區。
- 36 Gerard P. Prendergast, Hui Sin Lam, and Yip Pui Ki,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an Influx of Tourists: A Hong Kong Case Stud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8, no. 4 (2016): 283-93.

- ⑳ 林沛理：《反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61。
- ㉑ 「D&G事件」指2012年1月9日，一名香港市民在尖沙咀“D&G”專賣店前拍照時被該店保安人員制止，且保安人員聲稱「僅有內地遊客才允許拍照」。幾天之後，數百名香港市民聚集在現場，對這一事件表示抗議。「蝗蟲廣告事件」指2012年2月1日，《蘋果日報》刊登了一份整版廣告，該廣告將內地赴港遊客、「雙非孕婦」等比作蝗蟲，並疾呼「香港人，忍夠了」，引發大量爭議。
- ㉒ S. Lin and F. Lin, “Why Framing National Identities Fails: A Case Study of the Anti-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14 August 2016).
- ㉓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2011年5月5日），[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consultation/draft\\_mne\\_subject\\_curr\\_guide\\_0505\\_2011.pdf](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consultation/draft_mne_subject_curr_guide_0505_2011.pdf)，頁7。
- ㉔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thnic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 ㉕ 〈北京號召進一步壯大抗暴隊伍，嚴厲制裁港英劊子手血債血還〉，《大公報》，1967年7月6日。
- ㉖ 李敏剛：〈中文之為大學理想〉，載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編：《中大五十年》，上冊（香港：出版機構不詳，2015），頁33。
- ㉗ 〈學聯就中文研究問題之立場書〉，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15。
- ㉘ 〈港府確定中文為第二官方語文，這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香港工商日報》，1968年6月18日。
- ㉙ 〈擬提請港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華僑日報》，1967年10月1日。
- ㉚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1 September 1969), [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61\\_1970/B10100031967AN67E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61_1970/B10100031967AN67E0100.pdf), 22.
- ㉛ Ming-kwan Le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119-32.
- ㉜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1981 Population Census”,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23 January 1982), [www.statistics.gov.hk/pub/B78201FA1982XXXXE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8201FA1982XXXXE0100.pdf), 92。
- ㉝ Siu 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ric Ma and Anthony Fung,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172-85.
- ㉞㉟ “Students Call for Hong Kong in Unified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February 1972.
- ㊱ 呂大樂：〈從港人身份認同看回歸十年〉，《同舟共進》，2007年第7期，頁14-15。
- ㊲ 鄭艾倫等編：《英文何價？教學媒介與香港教育：與社會人士報告書》（香港：出版機構不詳，1973），頁21-22、37。
- 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語文學習支援〉（2014年4月10日），[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sbss/language-learning-support/featurearticle.html](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sbss/language-learning-support/featurearticle.html)。此文原於2014年1月底刊載於教育局網站，因引起巨大爭議，現已刪改。
- ㊴ 池偉添：〈粵語的政治〉，《文化研究@嶺南》，第46期（2015年5月1日），<http://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75&context=mcsln>，頁15-19。
- ㊵ 忤尚：〈香港新文學運動指引芻議〉，《學苑》，最終回（2017年3月28日），<https://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頁55-59。
- ㊶ 〈保衛釣魚台五·一三大示威告全港市民書〉，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37。

- ⑥1 何厚昌：〈示威者言〉，《學聯報》，1971年8月1日。
- ⑥2 〈前言〉，載蔡子強等編：《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1981-1997)》(香港：青文書屋，1998)，頁3-6。
- ⑥3 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200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2001年10月26日)，[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82001XXXXB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82001XXXXB0100.pdf)，頁33。
- ⑥4 王伯健：〈再見愛國〉，《理大學生報PolyLife》，第18期(1989年9月)，頁5。
- ⑥5 蔡子強等：《同途殊歸》，頁249。
- ⑥6 Ian Scott, "The Disarticulation of Hong Kong's Post-Handover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no. 43 (January 2000): 29-53.
- ⑥7 Nogk Ma, "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Hong Kong", in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xpansion of Protest Space*, ed. Khun Eng Kuah-Pearce and Gilles Guiheux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53.
- ⑥8 Chandler Clay, "Discontent Afflicts Hong Kong: Protest Epidemic Reflects Rising Anxiety of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Post*, 28 June 2000.
- ⑥9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第26期(2014年10月)，頁113-52。
- ⑦0 〈新華社規範新聞報導用語 禁用「影帝」、「影后」等詞語〉(2015年11月5日)，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2015/1105/c87423-27782404.html>。
- ⑦1 〈藝人稱大陸內地 龍應台：不妥〉(2013年1月7日)，奇摩新聞，[tw.news.yahoo.com/藝人稱大陸內地-龍應台-不妥-092412085.html](http://tw.news.yahoo.com/藝人稱大陸內地-龍應台-不妥-092412085.html)。
- ⑦2 Dingxin Zhao, "Theoriz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ocial Movements: Illustrated by Protests and Contentions in Modern China",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9, no. 1 (2010): 33-50.
- ⑦3 徐靜、陳翔：〈港大內地報名人數猛降〉，《廣州日報》，2015年7月24日。
- ⑦4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2015)，第十三章；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第二、三章。
- ⑦5 突破機構：〈青少年傳統價值與社會責任研究〉(2003年4月)，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
- ⑦6 周華山：《電視已死》(香港：青文書屋，1990)，頁127。
- ⑦7 Lars Willnat and Karin Wilkin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Mass Media Impact o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Mass Media in the Asian Pacific*, ed. Bryce T. McIntyre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29-43.
- ⑦8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
- ⑦9 Marilyn B. Brewer,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no. 2 (1999): 187-97; Siu 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 ⑧0⑧1 陳允中：〈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想像〉，《蘋果日報》，2013年5月29日。
- ⑧2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
- ⑧3 黃子悅：〈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政治區隔〉，《蘋果日報》，2016年2月1日。
- ⑧4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 ⑧5 周思中：〈本土的矩陣——後殖民時期香港的燥動與寂靜〉，《思想香港》，第3期(2014年2月)，頁14-21。

林 芬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助理教授

林斯嫻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博士生

附錄 香港學生運動與身份認同 (1968-2014)

運動領域		中文運動			保衛釣魚台運動		港陸爭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反二十三條	反國教	雨傘運動
象徵性資源		種族、傳統文化			種族、領土		文化(廣義)*		
邊界機制		有機	有機/志願	志願	有機	有機/志願	志願	志願	志願
時間		1968	1978	1999	1972	1996	2003	2012	2014
社會背景	政治	英國殖民政府/積極不干涉主義	英國殖民政府/協商民主	北京政府/一國兩制	英國殖民政府/積極不干涉主義	英國殖民政府/推進民主化	北京政府/一國兩制	北京政府/一國兩制	北京政府/一國兩制
	經濟	戰後繁榮/輕工業/財富分配不均	轉型/金融業(1970至80年代生產總值翻四倍)	後工業化	戰後繁榮/輕工業/財富分配不均	後工業化	後工業化	後工業化/財富分配不均	後工業化/財富分配不均
	人口結構/出生地	1971: 香港: 約56%, 中國其他地區: 約40%	1976: 香港: 58.9%, 中國其他地區: 38.6%	1996: 香港: 60.3%, 中國其他地區: 33.7%	1971: 香港: 約56%, 中國其他地區: 約40%	1996: 香港: 60.3%, 中國其他地區: 33.7%	2001: 香港: 59.7%, 中國其他地區: 33.7%	2011: 香港: 60.5%, 中國其他地區: 32.1%	2016: 香港: 60.7%, 中國其他地區: 31.0%
起因		社會重英輕中; 政府市民溝通困難	港大中大兩校入學試削減中文地位	英文中學轉中文中學; 政府推進「普教中」	美國劃分琉球及釣魚台歸日本	日本青年於釣魚台建燈塔, 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溺亡	香港政府推動二十三條立法	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科	特首選舉
結果		政府規定中文法定; 重英輕中未有本質改變	入學試錄取標準修正; 重英輕中未有本質改變	政府修正其語言政策	影響巨大, 領土仍處爭議中	無疾而終	二十三條立法程序終止	國民教育科永久擱置	無疾而終
組織參與者		學生/教師/各界	學生/教師	教師/各界/學生	學生/各界	前次保釣運動參與者/各界	各界/學生	學生/各界	學生/各界
運動反對對象		英國殖民政府	英國殖民政府	香港政府	日本/美國	日本	香港政府/北京政府	香港政府/北京政府	香港政府/北京政府
身份參照對象/「他者」		英國人	英國人、香港人	香港人	外國人(日本人/美國人)	外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認知的「中國人」形象		人數佔多數但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受到壓迫的「本地弱勢族群」	「本地弱勢族群」、「內地人」	「大陸人」	領土受到侵犯, 反抗外辱的「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內地人」	「大陸人」、新移民	「強國人」	「強國人」

資料來源：1971至2016年的人口結構數據，參見“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1981 Population Census”，*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23 January 1982), [www.statistics.gov.hk/pub/B78201FA1982XXXXE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8201FA1982XXXXE0100.pdf), 92; “Summary Findings of the 1986 Population By-Census”，*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November 1986), [www.statistics.gov.hk/pub/B78611FA1986XXXXE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8611FA1986XXXXE0100.pdf), 103;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報告〉(1997年6月1日)，[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91\\_2000/B11200831996XXXXC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91_2000/B11200831996XXXXC0100.pdf)，頁2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2012年2月21日)，[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552011XXXXB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552011XXXXB0100.pdf)，頁35；〈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2017年2月27日)，[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942016XXXXB0100.pdf](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942016XXXXB0100.pdf)，頁41。

說明：在2003至2014年間，「經濟」和「政治價值」成為重要的象徵性資源，影響着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在傳統的靜態二分法中，這兩種資源也大多被劃入「公民型」一類。在動態模型中，這兩種象徵性資源大多與志願型機制相結合。限於文章篇幅，筆者將另文討論這兩種象徵性資源對身份認同的影響。